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思想学说史

主编 张岂之

隋唐卷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学说史



隋唐卷

主 编 张岂之
分卷主编 洪修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本卷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曲安京 刘雪梅 江 海

宋玉波 洪修平 童 强

主
编

张岂之

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现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和独立撰写的学术著作有《宋明理学史》（与侯外庐、邱汉生合作主编）、《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华人文精神》、《中国历史》（六卷）、《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春鸟集》、《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历史十五讲》等，发表中国思想学说史方面学术论文多篇。

分
卷
主
编

洪修平

江苏苏州人，哲学博士。现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佛教文化历程》等十多部，另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二十多篇。

总序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撰述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整整六年。在我写序的时候,全部稿件已整理、修改完毕。朋友们曾建议我写一篇长序,叙述本书对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理解以及研究方法。也有朋友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一部书的思路、方法是不能脱离具体内容的,没有必要单独提出并加以论述。以我个人读书的习惯来说,特别是读学术著作时,首先要看序,希望序扼要地叙述书是怎样写成的,以及阅读时应注意哪几点。如果是长序,与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我往往略过,或者待读过全书以后再来补读。同时我相信,读者对于书的评价,并不以序为准,序里说得再好,读者未必相信,主要还是取决于书的内容。基于此,我决定为《中国思想学说史》写一短序,而且在序里只表述我

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此书其他作者。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思想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侯外庐先生。1948 年,外庐先生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开“中国思想史”课,我选读并且坚持听到底,受益不少。他将思想家和思想学派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去说明思想的来源及其影响,力求找到根底,是很有意义的科研工作。外庐先生在讲课中不仅给我关于思想史的具体知识,而且给我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离开学校,进入工作岗位,我又有机会参加外庐先生主持的一些编著中国思想史的科研项目,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对他的学术研究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自己的理解,他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史,并不以当时苏联官方和某些学者的意见为准,敢于和他们“商兑”。他强调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自身特点,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在外庐先生看来,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旧有氏族血缘关系去建立国家组织,可以称之为“早熟”文明,这种血缘的宗法制度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思想的进程。西周的宗法等级社会以及后来的封建社会都和这种氏族血缘的遗存有关。封建社会中的宗法、宗族力量就是从氏族血缘关系演变而来。外庐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皇权”及其对思想史的影响的分析,也有助于学人们的思考。还有,外庐先生研究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史的时候,注意到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某些变化,认为这在思想史上也有曲折的反映,他称之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它不同于西欧思想史中的文艺复兴,而带有自己民族的传统和特色。

学术上的创新是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有所吸取也有所前进。这就是说,继承和创新是辩证的统一。对于外庐先生的著

作,我们也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仅是外庐先生一人,我们从20世纪前辈学者的有关学术著作中也受到启发,而加以吸取。我们在撰述过程中还参考了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和学术史的著作,有所借鉴,这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和评论。

为什么这部著作取名“中国思想学说史”?“思想史”一词是20世纪初从日本学界移植而来的,源于西方。后来我国学者将“思想”与“学说”连用,如外庐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就是例证。后来这些著作经过修改补充,改名《中国思想通史》问世。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见以“学术史”为题的著作问世。学术史的撰述,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庄子·天下》是学术史,《荀子·非十二子》也是。史书中的《艺文志》包含学术史的内容。明清之际黄宗羲等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既是思想史,也是学术史。我国近现代,有不少著名学者撰写了学术史著作。

他们所阐述的“学术”,包含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也包括对政治思想的评价等。章太炎早年写成的《诂书》实际是中国思想学说史。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学人力图恢复这个传统,在新起点上进行中国学术史著作的撰述。今天我们看到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已有若干种,有的偏重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的着重典章制度源流演变的探讨,还有的侧重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考察。这些毫无疑问都属于“学术”范畴,书名“学术史”无可厚非。不过,将不同的学术内容都冠之以“学术史”,似乎有些泛化,从书名上显示不出书的特色来。如果将专门研究思想史的著作冠以“学术史”之名,也未必妥当,有以偏概全之嫌。鉴于此,我们这部书以“中国思想学说史”为名,是指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术史,有别于其他方面的学术史。国外

关于思想史的著作,大都直接用“思想史”为名,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①

《中国思想学说史》是一部集体著作。1999年有几位朋友建议:在20世纪内,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思想学说史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但这些成果需要加以系统的归纳;同时也要看到这个被称为“专门史”的学科内还有不少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现在无论从大环境或小环境看都具有了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在几位朋友的敦促下,我于当年草拟了《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将中国思想学说史按照历史顺序和思想特点分成六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每一卷关于思想学说的论述,并不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而以思想学派和问题为主展开分析,因而每卷都有篇名,下设章、节,这样论述会更加集中。在注意概括有关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某些独立自得观点的阐述上。我们在研究实践中体会到,即使是同一问题,或者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例如每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潮),只要深入下去,就会发现研究的空间是相当宽阔的,并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孔子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

① 在西方,思想史及其相关的英文表述有:1. Intellectual History,这种表述突出的是理智、知识等活动,如斯特龙伯格(Roland N. Stromberg)的《现代西方思想史》(*A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刘北成、赵固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 History of Ideas,可译为“观念史”,也有译为“思想史”,如六卷本《新思想史词典》(*The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DHI], by Maryanne Cline Horowitz,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4)等。3. History of Thought,直接译为“思想史”,thought这个词与idea有相近之处,但也有不同,thought和思考(thinking)关系密切。如斯考贝克莱的《西方思想史》(*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wentieth Century*, 7th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还要提到史华兹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B.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中译本,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乎”，确是学术研究的真理。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先秦卷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刘宝才教授和方光华教授主编；秦汉卷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黄留珠教授主编；魏晋南北朝卷由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刘学智教授主编；隋唐卷主编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洪修平教授；宋元卷主编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明清卷主编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肖永明教授和范立舟教授。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六年前就和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出版社相信我们肯定可以完成这部书稿，给我们支付了启动费。整个写作过程也是研究过程的继续。我们从阅读和修改稿件中学到不少东西，有部分稿件经过多次研究和修改才形成定稿。全书的统稿、修改是费时而艰巨的工作，在这方面我要感谢方光华教授，他做了许多工作。还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如果没有他们仔细的编校，这部书稿难以出版。我现在深感，一部首尾一贯的学术书稿，没有数年时间的耕耘，是难以成型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们延长写稿的时间，这种“谅解”难能可贵。

我觉得在序言里要说的话都已写出，希望读者朋友们多多赐教。

张岂之

2006年7月1日

目 录

绪 论

第一篇 民族社会篇

第一章 隋唐社会与思想文化 21

第一节 经济繁荣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推动 21

第二节 政治稳定与文化心态 27

第三节 科技文化灿烂与盛唐学术气象 40

第四节 科举的实行对学术思想的影响 53

第五节 帝王的宗教文化政策与儒佛道文化的鼎足 58

第二章 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多元 64

第一节 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 64

第二节 民族融合中的胡汉文化交融 71

第三节 文化的多元与多元的文化 78

第四节 民间文化的繁荣与隋唐思想学说 85

第三章	军事的强大与对外文化交流	90
第一节	疆域的辽阔与国防牢固	90
第二节	中外的交通与文化交流	97
第三节	“万国衣冠拜冕旒”	103
第四节	泽被东西的文化辐射	111



第二篇 儒学篇

第一章	隋唐儒学的经学背景	123
第一节	南北经学的统一	123
第二节	刘焯、刘炫的经学思想	126
第三节	隋代其他经学家的著作及思想倾向	128
第四节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131
第五节	从《五经正义》到《九经义疏》	134
第二章	隋唐儒学概论	140
第一节	儒学与隋唐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动向	140
第二节	隋唐儒学的流变与发展	146
第三章	王通的儒学思想	152
第一节	王通的生平著作及其新的解经学	152
第二节	王通对儒学的再认同与“三教可一”论	157
第四章	刘知几的史论与儒学思想	162
第一节	《史通》及其进步的历史观	162
第二节	刘知几的学术研究特色	168
第五章	韩愈的儒学思想	173
第一节	天道观与性情论的新探索	173
第二节	韩愈的道统论与反佛论	182
第三节	韩愈与中唐儒学研究	185

第六章	李翱的儒学思想	191
	第一节 李翱的性情论	191
	第二节 《复性书》的复性论	195
第七章	柳宗元的儒学思想	199
	第一节 “天人不相预”的自然观	199
	第二节 “圣人之道”与“统合儒释”	205
第八章	刘禹锡的儒学思想	213
	第一节 “天人交相胜”的天人关系新说	213
	第二节 柳宗元、刘禹锡历史政治观比较	219
第九章	复兴与徘徊:隋唐儒学的历史影响	225
	第一节 儒佛道三教纷争中的隋唐儒学	225
	第二节 隋唐儒学对宋明理学的开启	232



第三篇 佛教篇

第一章	隋唐佛教概况	240
	第一节 佛教的中国化与隋唐佛教的发展	240
	第二节 帝王的三教政策与佛教的鼎盛	251
	第三节 佛教文化的空前繁荣与宗派的创立	256
第二章	天台宗思想	264
	第一节 调和与圆融的特色	264
	第二节 性具实相与无情有性	275
第三章	三论宗思想	294
	第一节 三论学与三论宗	294
	第二节 诸法性空与中道实相	296
第四章	法相唯识宗思想	307
	第一节 印度渊源与学术传承	307
	第二节 唯识学与因明学	312

第五章 华严宗思想	333
第一节 一真法界与无尽缘起	333
第二节 会通本末的判教论	352
第六章 禅宗思想	358
第一节 东土五祖禅学思想之沿革	358
第二节 神秀北宗与息妄修心	370
第三节 惠能南宗与顿悟心性	378
第七章 其他佛教宗派的思想	405
第一节 三阶教的普法思想	405
第二节 西方净土思想	408
第三节 律宗的心法戒体论	413
第四节 密教与密宗	416
第八章 佛教思想与社会文化	420
第一节 佛教的社会性活动及对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影响	420
第二节 佛教思想与儒、道的融合	436
第三节 佛教与儒道之争及唐五代时的两次灭佛	439



第四篇 道教篇

第一章 隋唐道教概况	449
第一节 帝王的扶持与道教的皇室宗教地位	449
第二节 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道教发展	454
第三节 隋唐道教主要道派与理论建设	461
第二章 隋唐道教重玄学	465
第一节 关于重玄学的界定及理论渊源	465
第二节 成玄英、李荣的重玄学	472
第三节 唐玄宗的重玄思想	492

第四节 杜光庭的重玄学 503

第三章 隋唐道教心性学 513

第一节 司马承祯的主静坐忘论 513

第二节 王玄览的道体论 526

第三节 吴筠的道(心)性论 536

第四节 新道经的心性思想 546

第四章 唐五代钟吕金丹道的崛起 557

第一节 从外丹术到内丹学 557

第二节 钟吕金丹道的基本特点 564

第五章 道教与隋唐社会文化 572

第一节 佛道之争与佛道融合 572

第二节 道教的伦理化发展 578

第三节 道教与隋唐社会文化和信仰 584



第五篇 科技篇

第一章 隋唐时期的数学与历法 594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数学教育 594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历法 600

第二章 隋唐时期的农医与技术 605

第一节 农学 605

第二节 医学 612

第三节 社会工业技术 623

第四节 建筑工程技术 631

主要参考文献 639

绪 论

中国思想学说发展到隋唐,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儒学、经学、佛学和道学等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隋唐盛世造就的隋唐思想文化,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特点就是佛教兴盛为标志的儒、佛、道三教的鼎立。有学者称“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①,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隋唐思想学说特点的一种看法。隋唐时期三足鼎立的儒、佛、道三教关系,既是汉魏以来三教关系演变发展的延续,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的状况密切相关,而这种三教关系新局面的出现,对包括儒、佛、道三教在内的中国思想学说发展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

一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经西域传到中国内地之际,就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冲突和融合,互渗和互补,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儒佛道三教关系。三教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发展以及三教力量的消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长变化,对整个中国思想学说的发展、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仅构成了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说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国思想学说和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而隋唐作为三教关系转折的重要时期,三教鼎立新格局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就格外值得注意。

在汉代,初传的佛教主要依附黄老道术在社会上流传,并通过汉译佛经表现出道化和儒化的倾向。儒家则从佛教出家修行有违孝道等方面,对之加以排斥,而正处于初创阶段的道教却往往借助佛教这一比较成熟的宗教来发展自己。的佛教对儒和道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由于儒家名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因而佛教对儒学的态度是以妥协、调和为主,有时也积极迎合。对道教,佛教则把自己与道家作了区分,一方面引老子与老子之道来为自己辩护,借助神仙方术来传播佛教,另一方面又对道教推崇的辟谷长生等进行了抨击。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失去了两汉经学独尊的地位,但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主导作用,这个时期儒家的反佛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和伦理纲常等方面来排斥佛教,但也开始从哲学理论的层面对佛教加以批判。佛教在与儒、道的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通过依附魏晋玄学而“因风易行”,迅速传播。由于玄学本质上是儒和道的融合,因而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表现出了三教融合的重要意义。由沙门敬不敬王者引发的佛法与名教之辩和由老子化胡说引发的佛、道之争等,反映了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在并存共进中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也从反面促进了三教各自的发展。随着三教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佛、道二教的成熟,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儒佛道三教之间曾有过夷夏之辩、神灭与神不灭等的争论,而三教之间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①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汉魏以来三教之间长时期的冲突与融合使各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消灭他方的不可能以及借鉴吸取他方的长处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到了隋唐时期,三教虽然矛盾不断,三教优劣高下的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但从总体上看,

^① (北周)道安:《二教论》引,载《广弘明集》,卷八。

三教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在理论上相互融会,成为这个时期三教关系最重要的特点。三教关系终于迎来了隋唐时期三教鼎盛的思想学说新局面^①,而这种新局面也正成为隋唐思想学说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

这一思想学说新局面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它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与隋唐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都密切相关。

隋唐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统一。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从政治上看,隋唐时期的政治在总体上较为稳定,特别是唐朝前期,政治清明,君主明智,行政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决策往往能在众臣的讨论和权衡下作出,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甚至佛道人士也有机会参与政治。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文化上则表现为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心态,从而为各种思想学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的帝王虽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对儒佛道三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正是顺应了大一统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在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和三教共同发展的思想学说新局面。

经济繁荣与科技文化的发展对隋唐思想学说的推动也不可忽视。隋唐时期的科技与生产力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水稻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开拓、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科技成就,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说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所表现出的民族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与隋唐思想学说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也是非常吻合的。隋唐时,思想学说的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经学上,出现

① 关于汉代以来的儒佛道三教关系,参阅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2002(3)。